

跨文化种族焦虑

——《德西蕾的孩子》的空间表征

董雪飞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德西蕾的孩子》是一部以异族通婚为主题的地域小说,再现了跨文化、跨地域和跨种族的空间冲突。在20世纪之交的文学场中,为了迎合通俗杂志对战前南方的文化臆想,文本把混血儿建构为白人克里奥尔人特权的威胁者和侵占者,在家庭、社会与历史的后殖民空间中表征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社群的权力失落。德西蕾的悲剧被归咎为混血儿跨越种族的边界,影射了在北方意识形态挤压下,南方传统社会秩序解体所造成的心理、种族和政治焦虑,反映了肖邦的地域书写策略和价值选择。

关键词:后殖民;跨文化种族焦虑;白人克里奥尔人;混血儿;空间表征;《德西蕾的孩子》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1)01-0050-07

0 引言

《德西蕾的孩子》(*Désirée's Baby*)是凯特·肖邦(Kate Chopin)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评论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奴隶制、性别政治和肖邦的种族立场等方面。波特从(Richard H. Porter)肖邦作品中的黑人形象入手,认为很少有作品像《德西蕾的孩子》对奴隶制的控诉如此地切中要害和具有毁灭性,奴隶制应该对黑人的问题负责(Porter, 1971: 41)。沃尔夫(Cynthia Griffin Wolff)从肖邦关注人物内在心理的角度提出肖邦对奴隶制这一社会问题并不感兴趣,她只是象征性地提及肤色困境,关注的重心是人性普遍的善与恶(Wolff, 1978: 123)。皮尔(Ellen Peel)从语义分析和政治批评的视角研究了德西蕾作为空洞的能指对表意系统的颠覆及其局限,《德西蕾的孩子》在语义上的破坏作用超过它的政治意义,她只是破坏了表意系统,并没有质疑支配系统(Peel, 2007: 80)。陈亚丽分别从种族压迫、性别歧视以及叙事的角度出发,分析造成德西蕾悲剧命运的原因,认为德西蕾是种族、阶级、性别压迫的牺牲品(陈亚丽, 2009: 80),小说对奴隶制和性别歧视进行了严厉的控诉(陈亚丽, 2010: 3)。申丹从隐形作者和潜文本的角度分析了潜藏文本中白人受害者(上帝的殉难者)和黑人迫害者(魔鬼撒旦的化身)之间的对立,小说暗含的潜文本表明肖邦在为奴隶制辩护,凸显了白人纯洁善良/黑人邪恶的种族话语(申丹, 2018: 124)。“申丹对肖邦作品的隐性叙事研究破除了肖邦是一个反种族主义的、进步的女性主义作家的神话,拓展了肖邦研究的阐释维度和深度。”(董雪飞等, 2020: 25)《德西蕾的孩子》是一部涉及异族通婚的地域小说,故事情节在跨文化、跨地域、跨种族的空间冲突中展开。“空间常常起到比喻修辞的功用,喻指文化定位—喻指在空间和历史上产生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它将作品看作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理、象征或标记了人物在大社会中的具体文化定位。”(弗里德曼,

收稿日期:2020-05-20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凯特·肖邦的地域美学研究”(20SKGH131)、四川外国语大学2019年度校级科研立项一般项目“凯特·肖邦的地域美学研究”(SISU2019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雪飞,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现代主义小说与文化研究。

2014:195)“它(身份地理学)将身份看作一种充斥历史意识的地方、一种关系结构、一种定位、一种立场、一块地域、一个交叉点、一个网络、一个汇集了多重情境知识的交叉路口。”(陈丽,2015:145)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文本在多重空间中再现性别、地域、权力、种族、文化与身份之间的关系。

《德西蕾的孩子》的物理空间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文化空间则置于美国北方与法国、路易斯安那之间权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语境中,“就其权力构成来看,路易斯安那不是一个战后的南方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后殖民社会”(Golowyn,1994:2)。从文中人物的肤色来看,阿尔芒的父亲、瓦尔蒙德夫妇是白人克里奥尔人,对应于路易斯安那的上层阶级,占据传统的权力空间;阿尔芒的母亲、阿尔芒、拉布朗什、拉布朗什的儿子、赞德琳都是混血儿。路易斯安那的现状是部分混血人种属于自由或半自由的状态,区别于完全不自由的黑奴,处于南方社会的中下层空间。德西蕾虽被上层白人收养,但是缺乏固定的身份。混血儿和德西蕾的种族/阶级身份如同漂浮的能指,具有在不同空间之间滑动的可能。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场中,为了满足北方读者的期待视野,迎合通俗杂志对战前南方的文化臆想,肖邦挪用了混血儿的悲剧传统,在家庭、社会 and 历史的三重空间中表征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的权力失落。德西蕾的悲剧被归咎为混血儿跨越种族的边界,影射了在北方意识形态挤压下,南方传统社会秩序解体所造成的心理、种族和政治焦虑。

1 家庭空间的秩序威胁

在父权制结构下,家庭是男性权力的实施空间;在种植园制度下,家庭是肤色政治的表征空间,肤色与性别划分阶级位置,从而决定对特定空间的使用和占有。“基本的、物理意义上的入场权,即允许进入特定的空间,在殖民和后殖民世界里支配着一系列经验等级的地理和空间划分。”(Bowman,2010:58)白人的家庭空间是庄园内部权力秩序的中心,白人对家庭空间的支配是维护权力等级的基础。庄园的家庭空间因为跨族群的接触,造成原有疆界的松动。“接触地带的交往叙事常常一方面显示了在自我与他者的坚实边界之间的矛盾摇摆,另一方面则展示了对固定边界的越界。”(弗里德曼,2014:217)拉贝庄园的家庭空间,充斥着混血儿,不断挑战权力的边界;女性混血儿与主人之间的暧昧关系,造成种族的混杂化,逆向改写权力秩序。

通过肤色对比,混血儿被建构为白人克里奥尔人家庭空间的入侵者和威胁者。德西蕾的洁白与赞德琳的黄色形成第一组视觉对比。“年轻的妈妈正在慢慢地复原,她穿着柔软洁白的镶边平稳布裙,平躺在沙发床上……那个黄皮肤的女保姆坐在窗前,自己摇着扇子。”(肖邦,2010:12)德西蕾是一个极具传统美德的白人女性形象;作为混血儿的赞德琳却没有仆人的谦卑。瓦尔蒙德夫人向赞德琳问话时,她的表情非常“庄重”。有学者认为赞德琳表现出的傲慢,是因为发现德西蕾孩子的肤色,赞德琳其实是歧视自己同类的种族主义者。(申丹,2018:116)传统的解读倾向于从二元对立框架分析种族形象,容易忽视种族间的权力越界与微观抵抗。法依(Frantz Fanon)在论及黑人妇女和有色妇女差别时指出:“前者(黑人妇女)只有一种可能和一桩心事:变白。后者不仅想变白,而且要避免倒退。”(法依,2005:39)由此观之,赞德琳的傲慢表现一是可能内化了殖民主体的价值观,有色妇女渴望成为白种女人,是对殖民主体的模仿;二是可能害怕变黑的心理焦虑引发的过敏反应;三是赞德琳有意识地彰显自己的主体地位。赞德琳不像常见的黑人奴仆那样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很可能因为她的肤色赋予其自由或半自由的身份。新奥尔良的社会现实是多种族并存的社会,路易斯安那不像其他的南方各州,大量自由、半自由的有色人种改写了那里的权力构成。“1840年,新奥尔良有大约两万名自由有色人种,晚至1860年还有一万一千名自由有色人种,他们构成了一个缜密的、复杂的阶级社群,远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自由的、有色人种的存在打破了理想的二元对立的种族结构。”(Alexander,2002:123)赞德琳的傲慢反映了家庭空间中白人单向权力受到的抵抗,构成对白人克里奥尔人

肤色政治的挑战;对赞德琳的负面呈现,折射出微观空间的等级秩序受到混血儿冲击时引发的心理焦虑。

拉布朗什与德西蕾构成第二组视觉对比,揭示混血儿对白人女性主体地位的威胁;拉布朗什的小屋对德西蕾的房间形成空间上的威胁,暗示混血儿以身体为介质改写克里奥尔人的婚姻构成。拉布朗什的私生子与德西蕾孩子的对比,暗示她们的孩子都是混血儿;拉布朗什与德西蕾的并置,表明拉布朗什对德西蕾构成潜在的竞争关系。德西蕾被认为是混血儿,构成对肤色政治的破坏,她和她的孩子都必须去殉葬,而同样肤色的拉布朗什却能够在种植园繁衍生息。拉布朗什的小屋在庄园空间的在场,解构了白人女主人对家庭内部空间的权力控制。“女性的性征可以看作一种身体权力,正是这种权力,通过实实在在身体的传递、混淆以及生殖的潜力,能够以最基本的形式打破所有的界限,从而拆解社会秩序。”(Bowman,2010:62)所以,德西蕾与拉布朗什的对比,引发对家庭空间中白人女性地位的担忧。

德西蕾与阿尔芒形成第三组视觉对比,揭示家庭主导权为混血儿侵占,给白人女性带来毁灭性灾难,实质上是对家庭空间中各种隐形混血儿的心理恐惧,因为奴隶的黑色是可见的,而混血儿的黑色却不可见。“她(德西蕾)带着异乎寻常的勇气,坚决否认这种说法。‘这是谎话,不是真的,我是白人!看看我的头发,它是棕色的;我的眼睛是灰色的,阿尔芒,你知道它们是灰色的。况且,我的皮肤是白皙的。’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阿尔芒,看看我的手,比你的还白呢。’”(13)吊诡的是,德西蕾的肤色是白色的,却必须要证明自己的种族纯洁,才能摆脱被强加的黑色诅咒,捍卫存在的权利。阿尔芒肤色更深,因为盗用家世、父权和夫权,其血统却从未受到质疑。德西蕾和阿尔芒都内化了种族政治的逻辑,成为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殉葬品,“通过阿尔芒经历的创伤,小说激起读者对因权力不平等而受到伤害的角色的同情,而不会去思考如何能够改变这种不平等……故事促使我们怜悯的是德西蕾和阿尔芒作为白人养育成人却必须要经受被告知是黑人的创伤”(Peel,2007:80)。因此,小说对白人的同情和对混血儿的谴责胜过对奴隶制的反思。“黑人妇女和混血儿构成的最终威胁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性作为介质负载了强大的对社群进行定义(再定义)这一事实本身。”(Bowman,2010:71)一个白人克里奥尔人的种植园变成了一个混血儿的种植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阿尔芒攫取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的权力空间,德西蕾则成了混血儿在阶级和权力攀爬途中的牺牲品。

肖邦本人是一个克里奥尔人,是爱尔兰人和法国人的混血,肖邦早年的家庭是一个混合种族的家庭,“肖邦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她后来关于种族通婚、混血儿文化的人物话语,因为这就是她家庭生活的一部分”(Taylor,2007:43)。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肖邦对异族通婚持否定的态度,“异族通婚是父权制教条中致命的缺陷。男性的性实践驳斥了霸权结构,打破了女性与奴隶的区别;种族主义与非种族主义的女性都感受到这种越界带来的威胁”(Papke,2007:28)。《德西蕾的孩子》再现了男性和女性混血儿跨越种族的边界,以身体为媒介改写了种族构成,挑战白人女性的家庭位置,侵占白人男性的主导权力,破坏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的家庭空间。

2 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困境

空间不仅意味着权力、等级、排斥或认同,而且空间本身具有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决定权力和等级的延续与更替。正如勒菲弗所指出:“空间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是工具性的”。(勒菲弗,2007:30)庄园制是南方根本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南方社会的繁荣休戚与共。《德西蕾的孩子》再现了混血儿统治庄园的恶果,导致庄园的没落与衰败,揭示南方种植园在空间上遭遇的再生产困境,表达了白人克里奥尔人族裔遭受危机时的种族焦虑。

瓦尔蒙德庄园代表了肖邦心中理想的庄园模样,与混血儿统治的拉贝庄园形成鲜明对比。瓦尔蒙德

庄园如同伊甸园；瓦尔蒙德夫妇代表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的典范。“瓦尔蒙德太太抛开各种猜测，她唯独相信，是仁慈的上帝见他没有亲生骨肉，便把德西蕾送来做她的孩子，享受她的爱怜。”（11）尽管德西蕾是一个弃婴，但瓦尔蒙德夫妇依然给了她亲子般的呵护。“当时，瓦尔蒙德先生骑着马经过家里的大门，看到她躺在大石柱后面的阴影里，睡得正香哩。”（11）在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的视野里，石柱象征男性权力，喻义男性为社会的支柱，是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力量。对于德西蕾而言，瓦尔蒙德庄园就是她的支柱。“眼见这姑娘年岁渐长，出落得美丽优雅，而且温柔贤淑，待人诚恳，成了瓦尔蒙德这个地方的偶像。”（11）在瓦尔蒙德这个乌托邦世界里，德西蕾从一个弃婴变成落落大方的淑女，文本表征了白人治理下的庄园和谐而宁静，是白人女性的庇护所，充满强烈的怀旧色彩。但是，也正是因为德西蕾的到来，瓦尔蒙德庄园增添了蒙羞的危险，寓意北方与南方的跨文化接触，给南方白人社群造成了不确定的风险；其二，拉贝庄园在空间上被混血儿占据，与之联姻的瓦尔蒙德庄园被殃及池鱼。小说把瓦尔蒙德庄园的遭遇归咎于空间上的困境，混血儿对白人克里奥尔人社会空间的侵占，毁坏了他们和谐的社群，庄园面临传承与声誉的双重危机。

拉贝庄园的空间特征与其主人的形象一起构建了一副地狱与魔鬼的意象。拉贝庄园的特征是通过镜像人物瓦尔蒙德太太来描述的，“她到了拉贝种植园，就跟每次一样，一见到它便觉得毛骨悚然……这房子的屋顶坡面陡峭，黑得像个蒙头大斗篷，一直伸到宽大的走廊外面。黄泥灰粉刷的房子被走廊环绕着，旁边生长着几颗硕大的深黑色橡树，枝叶繁茂，向外延伸，树荫就像一片棺材布罩，盖在房子的上方。”（11）拉贝庄园具有哥特式建筑的风格，给人一种阴森恐怖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拉贝庄园的黑色外观正好契合阿尔芒的性格特征。阿尔芒与老主人奥比尼的对比进一步揭示混血儿的反复无常与残忍暴虐。老主人在的时候，拉贝庄园其乐融融，而少主人阿尔芒统治的时候却是一副萧条肃杀、了无生气的景象，“年轻的奥比尼有严格的规章，在他的管束下，他的黑人都忘了怎么去找乐。”（11）而“老主人在的时候他们可是会的，老主人平生为人随和，对黑人颇为宽容”（11）。阿尔芒对奴隶的态度和奴隶们的反应，强化了拉贝庄园作为“地狱”的死亡隐喻，不仅暗示了德西蕾在拉贝庄园的命运，更预示拉贝庄园失去繁衍的能力，凸显了混血儿对白人克里奥尔人种族的伤害。文本暗示失去白人管理的混血族裔，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瓦尔蒙德庄园和拉贝庄园殊途同归的窘境都是由混血儿造成的，表明种植园失去了空间的再生产能力，折射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的权力再生产困境，这恰恰是南方白人社群现实的投射。文中说德西蕾是一群得克萨斯人留下的，这群得克萨斯人向西而行，很有可能是拓荒者，暗示了北方的移民源源不断涌入路易斯安那，跨越了种族与权力的边界。他们破坏了原有的宁静，冲击了路易斯安那的习俗、传统、社群和权力构成。“旅行——作为一种穿越空间的运动形式——使得自我在地理上、心理上或文化上的空隙空间上与他者相遇。”（弗里德曼，2014：203）北方作为更强势的一方，压缩了克里奥尔人的权力空间，不断增加的身份焦虑，激化了种族矛盾。面对战后北方的文化市场需要，混血儿被建构成南方白人悲剧的根源之一。南方重建时期，虽然在南方白人干预下，通过了隔离法案，但是作为制度化实践的奴隶制和南方的贵族传统已经被摧毁，白人克里奥尔人的乌托邦社群已渐行渐远。

事实上，肖邦家族曾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肖邦本人所处的文化空间，使其深深地认同种植园制度。肖邦曾经在丈夫的种植园过着闲适安逸的生活，夫妻间感情甚笃，后来肖邦丈夫的生意破产，庄园的衰败促使她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内战期间，肖邦夫妇支持南方盟军，战后肖邦的丈夫参加了维护北方人权力的白人同盟组织，明显感受到来自北方制度和权力的冲击。联系肖邦家族的种植园的没落，对

瓦尔蒙德庄园与拉贝庄园的再现,实际上哀悼了种植园制度在空间上的消失。

3 历史空间的权力失落

《德西蕾的孩子》的宏观背景发生在法国失去对路易斯安那的直接控制,美国北方的影响逐渐增强的历史空间,反映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的政治空间被压缩时的身份与政治焦虑。法国与路易斯安那曾经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1803年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以后,美国北方逐渐取代法国在路易斯安那的宗主地位。北方的意识形态引发白人克里奥尔人的反感与排斥,他们遭遇种族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无法与北方建立认同,又需要与有色人种的克里奥尔人相区别,确认种族身份的心理焦虑,加上与法国在历史与血缘上的姻亲关系,促使他们寻求对法国的认同。“肖邦的小说,描述路易斯安那的生活,表达了克里奥尔人的霸权,小说所关注的是欧洲的文化设想与价值体系,而形式上,表达的是战后美国服从于北方法律的新位置。”(Golowyn,1994:2-3)

法国象征了帝国的中心,作为自由空间的镜像定义了路易斯安那后殖民空间的性质,并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阿尔芒盯着她的眼睛,并不在乎这些,有人提醒他说,她可是个无名无姓的人,可名字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他能给她一个路易斯安那最古老、最荣耀的姓氏。于是,他就从巴黎订购了送给新娘的结婚礼品,耐着性子等着它的到来。”(11)阿尔芒家族作为路易斯安那一个有名望、有权势的家族,暗含了与帝国中心的密切关系,是殖民地的开拓者,也是帝国文化的继承者,经历了路易斯安那风云变幻的历史,但是北方的意识形态否认种植园的合法性,捍卫家族的世系和财产的传承,促使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认同法国权力。巴黎与路易斯安那形成了帝国都市(中心)/殖民地(边缘)的对比,象征了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路易斯安那与美国北方形成另一组对比,代表自我(主体)与他者(入侵者)的对比。

小说开篇不久叙述阿尔芒与母亲生活在法国,因为母亲眷恋故土,所以不愿来美国。故事的结尾表明,阿尔芒一家早年在法国生活是因为母亲的肤色问题。阿尔芒在处理德西蕾的遗物时,发现他母亲的信,信中说母亲来自“深为奴隶所苦的种族”(13)。这一结尾除了起到情节上的颠覆作用以外,对于揭示文本的历史语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阿尔芒与母亲一起生活了八年,按照常理,一个八岁的孩子应该能分清黑白的肤色,所以,可以推断阿尔芒的母亲不是纯黑人,很可能是一个肤色较浅的有色族裔,或者说是一个混血的有色族裔,那么阿尔芒很可能是一个具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血统的混血儿。按照路易斯安那的法律,一个白人与黑人或者肤色较浅的有色族裔通婚,即使这个有色族裔是自由的,也是违法的。所以阿尔芒的母亲很可能是一个自由女性,但是因为肤色不是纯白,为了规避法律上的风险,他们移居巴黎。阿尔芒的父母即使在北方结婚,也违反了南方的法律。所以要想维持婚姻并保全财产,他的父母只能远离故土。这反映了路易斯安那内部以及与北方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法国的自由空间与路易斯安那不宽容的种族关系形成对照,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婚姻提供庇护。设想阿尔芒与德西蕾生活在法国,这出人伦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如果生活在1803年以前的路易斯安那,他们的婚姻也可能是合法的。白人克里奥尔人的婚姻自由要到宗主国寻求庇护,表明他们自主权力的丧失,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化。

对法国的认同不仅因为血缘、族群和传统的影响,而且也因为白人克里奥尔人受到来自美国北方持续的压力。由于圣多明戈难民大量涌入路易斯安那,“政治上,讲法语的人数激增,增添了围绕路易斯安那是否应该忠于美国的争议,法语人口强化了三级的种族关系,让早已习惯二元种族结构的美国人备感困扰”(Leservot,2012:40)。战后北方要求路易斯安那接受他们的种族观,北方人不熟悉当地的传统,他们倾向于把白人克里奥尔人与有色人种的克里奥尔人归为一类。战前与战后秩序的冲突,引发了传统的白人克里奥

尔人的种族焦虑和对自己权力的抗争。美国北方移民的涌入,白人克里奥尔人的历史空间日益变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面临北方化的危险。“1803年以后的数十年,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的历史围绕着拉丁裔克里奥尔人、美国人以及外来的法国人对当地社会的控制,每一个团体都想把当地社会塑造成自己设想的样子。”(Tregle, 1992:141)所以,捍卫世代的生活方式、种族特权成为白人克里奥尔人的一种本能选择。对法国文化的眷恋,把有色人种的克里奥尔人以及混血儿表征为他者,自然成为自我确认的心理安慰。

肖邦本人精通法语,对法国文化非常认同,父亲过世以后,她与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对她有决定性的影响。“肖邦的祖母生活在圣路易斯,她仍然以自己是法国人为傲,在她自己的时代,或许给这个小姑娘一种时代错误感,但祖母鼓励她同情那种正在快速消失的生活方式。”(Howell, 1979:210)所以,肖邦本人对法国文化传统、克里奥尔人的文化、黑人文化、混血儿现象有自己的优劣判断和等级划分。对北方制度的排斥,面对白人克里奥尔人的历史空间可能被抹去的危险,文本利用混血儿这一意象,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目的是捍卫自我的族群身份。

4 结语

为迎合北方文学市场对后重建时期南方的文化想象,肖邦构建了以路易斯安那为中心的地域传说,在路易斯安那的乡间,“肖邦遇到并认识了居住在凯恩河谷的克里奥尔人、混血儿、黑人、南方邦联的退伍老兵以及沉寂的牛厄湖的棉花种植园”(Fletcher, 1966:122)。肖邦把为人熟知的南方混血儿悲剧编织到她的文本空间,为北方读者建构了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南方庄园故事,既熟悉,又新奇。世纪之交的文学场中,杂志编辑和文学市场对作家的创作具有重大影响。南方后重建时期,对奴隶制的态度,从批判转向宽容,废奴主义小说失宠于文学市场。对奴隶制和庄园生活的跨文化、跨种族、跨地域的怀旧书写,备受市场追捧。在编辑斯卡德(Horace Scudder)的提携下,肖邦得以在精英文学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发表三篇作品,并出版短篇小说集《牛厄湖的人们》(*The Bayou Folks*),主题之一是以南方地域为中心,探讨奴隶制解体以后黑人身心无处安置的悲惨状态。“肖邦对种族问题持有复杂的态度,虽然不像同时期其他大多数文本把黑人建构为魔鬼与天使的二元对立形象,但肖邦也常常因为自身立场的需要把黑人建构为各种负面的形象。”(董雪飞等, 2020:89)

《德西蕾的孩子》发表于1897年,此时,地域文学逐渐让位于现实主义文学,新兴的《时尚》杂志成为肖邦作品的主要发表刊物。《德西蕾的孩子》诉诸南方传统的性别、阶级和种族问题,建构了一部白人克里奥尔人社群危机的地域小说。“几乎肖邦所有的小说背景都放在纳奇多奇教区的克里奥尔人中间……她接受了克里奥尔人的世界观,用来烘托她的故事的气氛。”(齐夫, 1988:300)《德西蕾的孩子》表征了混血儿侵蚀克里奥尔人的社群秩序,构成对奴隶制的破坏,白人克里奥尔人遭遇家庭、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身份危机。面对白人克里奥尔人的种族空间日益混杂化、权力空间不断缩小的现实,肖邦怀旧与哀悼那个日渐远去的乌托邦社会秩序。肖邦的家庭背景、婚姻背景、政治立场和阶级位置都表明她极力捍卫传统白人克里奥尔人的种族特权,《德西蕾的孩子》表征了一个社会结构、种族观念和意识形态大变迁的时代对自我身份的种族焦虑。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Jr., Robert Allen. 2002. The Irreducible African: Challenges to Racial Stereotypes in George Washington Cable's *The Grandissimes*[G] // Suzanne Disheroon-Green and Lisa Abney. *Songs of the Reconstructing South: Building Literary Louisiana*

- 1865-1945.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Bowman, Paul. 2010. *The Rey Chow Reader*[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letcher, Marie. 1966. The Southern Woman in the Fiction of Kate Chopin[J]. *Louisiana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Louisian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117-132.
- Golowyn, Janet. 1994. Ethnicity Enacted in Kate Chopin's Short Fiction[J].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24):1-12.
- Howell, Elmo. 1979. Kate Chopin and the Creole Country[J]. *Louisiana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Louisian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 20, No. 2. Spring:209-219.
- Leservot, Typhaine. 2012. Auguste Lussan's La Famille Créole: How Saint-domingue Émigrés Became Louisiana Creoles[G] // Martin Munro and Celia Bittton. *American Creoles: The Francophone Caribbean and the American South*.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Papke, Mary E. 2007. Kate Chopin's Social Fiction[G] // Harold Bloom. *Kate Chopin*.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 Peel, Ellen. 2007. Semiotic Subversion in *Désirée's Baby*[G] // Harold Bloom. *Kate Chopin*.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 Porter, Richard H. 1971. Negroes in the Fiction of Kate Chopin[J]. *Louisiana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Louisian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2):41-58.
- Taylor, Dale M. 2007. *The Discourse of Inter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Identity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D]. Pennsylvania: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issertation.
- Tregle Jr., Joseph. 1992. Creoles and Americans[G] // Arnold R. Hirsch and Joseph Logsdon. *Creole New Orleans: Race and Americaniza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 Wolff, Cynthia Griffin. 1978. Kate Chopin and the Fiction of Limits: *Désirée's Baby*[J].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2): 123-133.
- 陈丽. 2015. 图绘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未来——评弗里德曼《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J]. 外国文学(6):138-145.
- 陈亚丽. 2009. 谁杀死了德西蕾——从种族和性别双重视角解读《德西蕾的孩子》[J]. 国外文学(1): 80-86.
- 陈亚丽. 2010. 未出场的颠覆者——对《德西蕾的孩子》的一种新解读[J]. 外国文学(5): 3-10.
- 董雪飞, 龚浩. 2020. 国内凯特·肖邦研究现状与反思[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4): 28-32.
- 董雪飞, 田静. 2020. 旧南方的新主体——凯特·肖邦内战小说的创伤书写[J]. 外国语文(1):85-91.
- 弗朗兹·法农. 2005. 黑皮肤, 白面具[M]. 万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弗里德曼. 2014. 图绘: 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M]. 杨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亨利·勒菲弗. 2007. 空间与政治[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凯特·肖邦. 2010. 德西蕾的孩子[J]. 陈亚丽, 译. 外国文学(5):11-13. (文中所标页码均出自此译本)
- 拉泽尔·齐夫. 1988. 一八九零年代的美国——迷惘一代人的岁月[M]. 夏平, 等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申丹. 2018. 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Transcultural Racial Anxiety: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Désirée's Baby*

DONG Xuefei

Abstract: *Désirée's Baby*, a local color fiction of miscegenation, represents the spatial conflicts in transcultural, transregional and transracial contexts. To cater the Northerners' cultural imagination over the prewar southern society at the turn of 20th century, mulattoes are constructed as a threat to the white creoles' privileges. The text represents the white Creoles' losing power in domest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spaces under post-colonial locality. *Désirée's* tragedy is attributed to the mulattoes' transgression of the racial border, expos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Southern social hierarchy under the imposition of Northern ideology which triggers the psychological, political and racial anxiety hereof, and also reflects Chopin's creative strategy and prefer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field.

Key words: post-colonial locality; transcultural racial anxiety; white creoles; mulattoes; spatial representation; *Désirée's Baby*

责任编辑: 路小明